

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

古学斌 张和清 杨锡聪

提要：过去6年，我们在云南省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村落推动一项名为“探索一个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目的是发展适合中国处境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模式。在我们与村民同行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扎根于中国本土的艰巨性。而感触最深的是，我们这些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复杂的村落文化处境时，一种无知和无能感常常使我们感到步履维艰。我们警觉到，在专业化实践中其实也同样遇见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出现的文化识盲的问题。本文将首先简单介绍我们的项目以及绿寨的一些基本状况；然后将以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为例，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乡村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接着，回到社会工作专业对于文化敏感实践的讨论当中，试图指出人类学中关于文化识盲的概念更能帮助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从而对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实践加以进一步的反思。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 文化识盲 专业限制 文化敏感

全新投入的志业所代表的是，行动不能与反省割裂。反省，是行动中不可或缺的。

——保罗·费雷勒(2003/2000: 85)

一、前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剧变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原有的国家社会福利组织已经无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无法满足市民的多元化需要。承担着各种社会服务的政府

^{*} 此行动研究得以推动6年，首先应感谢当地村民的接纳和爱护，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任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和现任系主任阮曾媛琪教授的大力支持，并感谢米索尔基金会和凯瑟克基金会提供的经费支持，也非常感谢参与这一项目的队员，其中包括：向荣、朱浩、刘静、杨静、小莫、洪蓓、张扬、刘庆伟、小葵等。

部门(如民政部等)、半官方机构(如妇联、共青团等)和新兴的非政府部门也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国接受专业社会工作训练的人员还很匮乏。中国政府看到了社会的需要,也认同社会工作专业能够发挥的稳定社会、帮民解困的作用。因此,各级政府积极推动高等院校发展社会工作专业:自从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以来,至今中国内地已有180多所院校先后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办了首届“社会工作文学硕士(中国)课程”,^①希望能够培养社会工作教育的师资以回应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师生三人有幸成为这个硕士班的一分子。从2001年开始,为了配合硕士课程实习的需要,我们在云南省的一个壮族村落建立了实习点,之后继续在这个点上开展工作,希望能够为农村社会工作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6年过去了,我们深感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扎根于中国本土的艰巨性。而感触最深的是,我们这些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复杂的村落文化处境时,一种无知和无能感常常使我们感到步履维艰。在村庄浸染得越深,与村民走得越近,自己就越无知。我们用专业社会工作“助人”的价值观、方法和技巧等在村庄推动一些项目的时候,总是遭遇到重重困难,效果不是很明显,甚至有时与我们“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的目标相冲突。

面对这些困局,我们的团队不断自我反思批判,警觉到在专业化实践中其实也同样遇见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出现的文化识盲问题。本文将首先对我们的项目以及绿寨的一些基本状况作一简单介绍;然后将以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为例,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乡村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接着,回到社会工作专业对于文化敏感实践(cultural sensitive practice)的讨论当中,试图指出人类学中关于文化识盲的概念更能帮助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从而对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实践加以更进一步的反思。

^① 该课程在2004年改名为“社会工作硕士(中国)课程”。

二、项目和所在村落——绿寨

为了更好地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方法，从2001年3月开始，我们在云南推动了一项名为“探索一个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①在云南省某县人民政府的协助下，我们确定了一个壮族少数民族村落——绿寨^②，作为我们的项目点。

绿寨是云南省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行政村，全村共347户，1469人，壮族占全村人口的80%以上；八个自然村（村民称为寨子）中，其中两个是汉族村；绿寨也是一个典型的山寨，壮族聚居在“槽区”（山间盆地）的五个自然村落中。村寨只有一条机耕路与外界相连，如果不是赶集，一般老百姓都很少外出。至今这里仍然保存着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外界的人很少来到这里。但是近年来，绿寨也受到现代化发展的猛烈冲击，譬如“村村通”的广播电视，使村民对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提高了他/她们的消费欲望和对现金的需求，也改变了他/她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外界的吸引也使青壮年的村民不断外出打工。另外，政府的发展政策，诸如农业商品化和科技化、旅游开发等也不断冲击到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

根据当地政府的一些数据，绿寨基本上是一个在温饱线徘徊的贫困山村。全村在正常年景下每年有20多户人家4—6个月缺粮。根据2000年8月“绿寨村委会救济花名册”统计，那一年全村就有62户、285人接受粮食救济；又根据“2002年度绿寨村委会农业税社会减免申报表”统计，当时全村有16户、44人由于“特困”全免农业税。而两个汉族村则位于偏远的山上，土地瘠薄，常有村民借高利贷买粮度日的情况发生。绿寨村因此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当地政府将“冬季农业开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高科技品种”等作为绿寨这样的村扶贫攻坚的主要方式。在工作中，我们发现这些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少项目还弄巧成拙，使得村民更加贫困。

①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行动研究，那就是研究不是单纯为了收集资料，更重要的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和实践，其结果可以对社会政策提出建议，并且带来社会的改变和变革（参见 Zuber-Skerritt, 1996）。

② 本文所使用的县、乡、村庄名称以及人名全部为化名。

面对这样一个贫困村寨,我们希望通过乡村实践找到一条中国乡村社区发展的另类出路。表面上看,我们的做法与其他非政府发展组织所做的工作似乎没有太大差别,譬如我们也采用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的方法了解社区民众的需求:如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推动沼气建设,建立社区中心,设立图书馆,成立乡村文艺队,成立老年人协会,推动夜校扫盲班,开动经济创收项目,保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不过,这些项目对我们而言只是媒介,我们主要希望依靠项目的开展能够发育出不同的社区组织,在组织的过程中提升社区民众的能力,使他/她们最后能够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例如,虽然同样是资助失学儿童的项目,但基金会所捐助的款项不是由我们或者村委会来管理,而是交由不同村民(包括妇女、小学老师、青年人等)组成的教育基金管委会来管理,由他们讨论决定资助的方法和名额、管委会的运作模式、换届选举的形式等。即以项目作为载体,培育社区民众集体合作的精神,以及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的能力。

三、专业社工在乡村实践中所遇到的困境

6年过去了,我们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工作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要想继续往前走,需要自我反思和批判的东西很多,其中专业知识与当地文化的矛盾尤其值得反省。这些矛盾从理论上我们是有所警觉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又常常堕入了专业知识的陷阱。这与人类学所言的“文化识盲”^①(cultural illiteracy)非常类似。这种文化识盲使得我们在推动项目时失去了文化的敏感,导致项目出现各种困境。就此而言,可以分享的事例有很多,限于篇幅,我们仅从两个具体的例子开始,阐述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者在具体的村落环境中的文化识盲和文化敏感性问题的。

案例一:开会和讨论

^① 按潘英海的说法,文化识盲的概念来自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贝森(Bateson)在研究人类的精神分裂症状时所提出的“双盲假说”(double blind)。贝森指出,人在沟通时,当一个人处于一套交织稠密的人际网络之中,被两组不同而又矛盾的讯息牵绊住,而其中一组讯息又否定了另一组讯息时,就会出现无法解读在人际互动中的深层讯息(meta-message)的认知盲点(潘英海,1997)。

2002年,我们刚刚进入村落时,通常使用口述史的方法^①认识社区,与村民建立信任关系,并且动员社区民众参与各种兴趣小组,从而发育当地的组织。在口述史项目的基础上,2004年我们又与部分村民一起收集“村史”,期望通过大家一起写村史的行动计划,提升社区民众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认同,建立他/她们的民族自信心。在2005年,我们试图通过“大家一起讲故事”活动,持续跟进前期的“口述史”和“村史”计划,希望与村民一起推动保护地方性知识的工作,这样既可以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当地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更能够推动他/她们文化身份的认同和自信心建设。

回顾整个“口述史—村史—讲故事”的历程,为了实现我们的信念(文化与发展的目标)，“开会”和“讨论”几乎贯穿了整个计划。而开小组会和讨论是社会工作中常用的手法。每次召集村民开会前,我们自己都要召开预备会议,反复讨论计划的可行性,整个项目的信念和目标,用什么手法让村民明白我们的意图,以及计划执行的具体分工和步骤等等。然后将同样的手法贯彻在村民小组的会议上。会议结束后,我们及时开会反思成败得失。

一般而言,我们采用两种方式与村民开会讨论。一是在每个计划推行前召集社区积极分子(村民)开会。具体的做法是,在开会前我们分工入户通知他/她们来开会,详细告诉他/她们开会的时间、地点、讨论内容,并重申会议的重要性。最后的结果是,通知到了的村民基本上如约赴会,但他/她们往往姗姗来迟,因为村民们一般要到晚上9、10点以后才把农活、吃饭、收拾、家务这些事情忙完。妇女们还要织布和伺候老小到更晚。例如,我们通知晚上8点开会,村民一般要到9、10点甚至11点才能陆续到齐。会议总算可以开始后,我们先将自己的意图和想法抛给村民,详细告诉他/她们整个计划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并希望他/她们展开讨论。但是到此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村民的反应很慢,他/她们要在我们的不断追问下,艰难地用我们勉强听得懂的壮族普通话回应提问。村民的母语是壮语,他/她们也可以用流利的云南方言进行交流。但是面对我们时,他/她们却选择了自己最不擅长的普通话。虽然我们多次告知村民可以用壮语或云南方言来讨论,然后通过代表用普通话总结让我们知道他/她们讨论的结果。但可能是因为我

^① 方法的运用详细可参见古学斌、陆德泉,2003。

们在场,也可能是基于礼貌的缘故,他/她们还是结结巴巴地用普通话迁就我们。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我们会努力推动第二种会议形式,也可以称作“分享会”。在计划告一个段落或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便召集村民开会讨论,推动他/她们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例如在做村史的项目过程中,开会时我们会不断提醒村民“说说收集‘村史’的体会吧!”“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吗?”“大家都谈谈这次活动的感受好吗?”“这个活动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村民面对这样的提问基本上用沉默应对,或者只是简单地说:“我们不会说”。这时我们总是感觉到尴尬和挫败。由于村民的沉默和我们的坚持,这样的会议一般持续很长时间,有时候为了达成所谓的“共识”,会议可能拖延四、五个小时而没有结果。有些村民说:“我最怕开会了,太严肃了,屁股都坐痛了,唱歌跳舞最好玩。”

另外,我们常用的一种手法是用文字来总结村民的意见和看法,那就是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在教室的黑板上贴满一张张的大白纸,把大家的看法总结分类,有时甚至要求村民写出他/她们的意见。当然,这种手法也有所变化,那就是用画画的形式,让他/她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很明显,年轻的村民比较喜欢画画的方式,老人却不太了解我们要干什么。

虽然我们知道村民不喜欢开会,工作人员也曾经反映过开会这种形式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太正视这样的问题,每次还是用开会的形式。香港专业社工组织的手法和文化就是开会,若只讨论而不开会往往会超出我们这些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想象。

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开始敲醒了我们。2005年暑假,我们再次收集村史时,老党员吴大爹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那就是当年共产党开会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的故事。吴大爹是当地壮族,1952年参加剿匪、土改,1954年入党,1956年推动村民加入高级社。

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开很多会。那时候(1956年)刚开始召集群众开会很难的,工作组干部(汉族)讲的话群众听不懂,每次晚上开会群众活计重很累啊,很多人都不会来,来的也很迟了,还在打瞌睡,工作推不下去啊。他/她们(工作组)找我,我会说壮语,最会

唱小调^①,让我发挥作用。那时候我就用小调吸引群众参加开会。刚开始开会的时候根本没有村民来参加,我就唱小调吸引群众来,许多群众都来学唱小调,一些群众还来和我对小调,我唱的好,还对的和(对唱的很符合意思),就吸引了一百多人来开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先唱小调,大家高兴了也不打瞌睡了,我就给群众讲党的入社政策,慢慢地群众就拉牛马这些来折价入社,慢慢地高级社就搞起来了……

在吴大爹的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自己的身影。我们在村里不也是开会吗?村民的反应为什么不一样呢?共产党当年在农村的工作手法能够结合当地的文化,为何我们这些专业社工却要持守我们的一贯手法呢?什么阻挡我们的视线,蒙蔽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手法呢?这纯粹只是技术的问题吗?手法的采用到底反映了我们背后的什么意识形态?

案例二:妇女手工艺小组中的公平与平均

在专业社工的价值理念中,持守社会公正的理想,背后有资源公平分配的假设。我们在村里推动项目的时候,也一直秉承我们所相信的理念。譬如2001年我们开始推动妇女小组的建立,很快地绿寨的所有自然村便成立起了多个妇女小组。我们期望通过这些妇女小组带动全村(行政村)的性别平等与发展,同时希望每个自然村的妇女都能够参与,在一些具体的利益分配上,每个村的妇女都能平均得利。

在妇女小组的项目中,2002年底到2004年初所推动的绿寨妇女手工艺品项目,是我们至今仍引以为戒的典型案列。

从2002年开始,我们努力把槽区(河谷)附近比较集中的五个村寨的妇女组织起来,推动妇女以自然村为单位(这是她们得到支持的前提条件)合作生产手工艺织品,包括壮锦床单、围巾、钱包等,我们把这些制成品运到香港义卖,最后把利润返还给妇女小组。项目希望妇女们除了获得收入补贴家用外,还能够用部分赢余建立妇女储金会,发展公益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注重发育妇女组织,推动她们互助合

^① 当地壮族(沙人)没有文字,他/她们用“小调”这种平缓的歌曲形式将自己的历史、风俗习惯、神话传说、谈情说爱等文化意涵传唱出来。小调自古流传至今,这种文艺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一直热衷于传唱。

作,以实现能力建设的目标。因此,在项目进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将手工艺品买卖作为组织发育和经济创收的平台,重点关注有更多妇女平等参与,收入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以及建立公共基金等问题。

各村的妇女一开始都积极响应,迅速建立了符合项目要求的妇女小组,推举出了小组负责人,我们也给各村妇女小组平等地分配了生产任务。各村各组自己垫付了本钱购买原材料(线),迅速投入生产行动。整个生产过程非常顺利,妇女们不仅产出很快,而且在小组中能够做到彼此合作、互相帮助。譬如,手艺好的妇女会无条件教授手艺比较差的妇女。妇女们组织在一起,除了互相交流壮锦制作和刺绣的技术外,彼此间还增进了感情,扩大了人际关系网络等。

就在项目顺利推行、手工艺品销售后利润返回绿寨的时候,各村妇女们的矛盾浮现出来了。有一天,我们召集了妇女小组成员开会,正准备讨论利润平等分配和储金会成立等事宜的时候,各村之间因分配利润的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妇女们既反对按照村子平分,也反对按照人头平分。如果按照村子平分,A村不同意,因为A村动员参与的妇女最多,生产的成品也最多,这样分配她们认为吃亏了;如果按照人头平分,B村认为不合算,她们强调按照我们的要求动员了大多数妇女参与,而且她们村人口本来就比A村少,这样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她们做的质量比A村好,主张应该按照村子平分;C村的一些妇女既不关心按人头分也不讨论按村子分,她们怀疑我们拿她们的东西卖了高价,在中间截留了利润,她们要求公开真实的出售价格;D、E村也有自己的说辞。面对如此复杂的矛盾,我们的工作人员承受了巨大压力和委屈,工作人员说:

记得当时妇女们关于如何分配资金而僵持不下,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妇女,僵持了半天的时间没有结果,急的手足无措,乱了方寸。后来,在团队的协助之下,才勉强打发了妇女们,但妇女小组与小组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面对这种事与愿违的困局,刚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大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过分地强调了公正、平均、组织、合作等信念,而忽视了各村和每个妇女的现实利益需求,矛盾的根源是经济利益冲突。但我们在村庄浸染久了,特别是在后来的“口述史”和“村史”访谈中,

我们发现村落权力文化关系才是经济利益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些老人回忆说,现在槽区(河谷)的村民小组(自然村)不是传统的“老桩桩”(自古就在),而是由人民公社时期强制成立的生产队演变来的。古时候传下来的村庄有A、B、D、E村,而C村是后来搬来的,他/她们是来这里帮忙的。解放前,A、D、E村基本上是董、吴、黄、王、刘几个祖宗传下来的,他/她们属于一个主族(宗族)控制,是合在一起的,祭祀同一个“老人房”(祖宗)和“山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大家的关系比较亲密;而B村主要居住着刘、何、吴、张等主族,他/她们也有自己的“老人房”和“山神”;C村则是以杂姓居多,王、熊、陶、杨等姓氏为主,也有单独的“老人房”和“神山”、“神树”等。这些复杂的家族宗亲关系,深刻地影响到村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随着我们对村里的家族、宗族、姓氏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终于开始理解为什么分配手工艺品收入时,B村妇女对A、D村意见很大,总觉得A村妇女在欺负她们。也开始理解C村妇女为什么总是关心自己的问题。

这一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如果专业社会工作者只是拥抱一些抽象的专业价值理念,而无视当地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权力关系,其工作不过是一种盲动,只会对当地的社区制造更多的矛盾,而无助于社区的能力建设。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对当地文化脉络有一定的掌握和敏感,就可以避免硬套我们的专业原则,通过不同的手法,先培育民众的能力,缓减不同村落民众之间的矛盾,让她们能够为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放下彼此间的成见,然后才组织她们,达到我们坚信的公平公正、合作参与等目标。

四、社会工作与文化相容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文化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各家各派皆有不同的解释(Bennett, 1980)。在这里,我们采用雷蒙·威廉斯的理解,那就是文化是特定社群的特定生活方式,也是生活意义产生的过程,是一种意义指涉的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Williams, 1983)。因此,文化背后呈现的是特定社会群体对事物的观念、看法、信念、价值和规范。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起着命名事物、表述感受以及建立关系的作用。语言不只描述状态,而且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看待事实的方法(Johnson,

1997)。当不同的社会群体相遇时,文化上的问题会相应产生。对于这一点,西方人类学早有深刻的反省。“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和“文化偏见”(cultural bias)就是不同文化相遇时出现的问题。“文化震撼”指的是当我们去到异文化社群时,对当地文化产生一种陌生感觉而出现的心理上的一种不适。而“文化偏见”是基于种族/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而出现的一种态度,就像我们住在盒子里头,看不到外面一样,总是不自觉地用自属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观念,去推断其他社会群体。从自属群体看事情的习惯,会认定自己的文化/群体是最优秀的,从而对异地文化/社群有一个高低的评断,进而产生我们所说的文化偏见、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负面刻板(negative stereotype)等现象。

社会工作专业非常看重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的问题(O'Hagan, 1999; Butler & Molitor, 1995;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 2001; College of Nurses of Ontario, 2005)。因为社会工作专业是一种助人专业,如果在实务工作中缺乏文化敏感度,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观念强套于案主/服务对象身上,形成一种文化的侵略或压迫,更严重的是可能对案主(client)造成重大的伤害(见 O'Hagan, 1999; Jackson & Lopez, 1999)。因此,在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中,课程皆致力于培养和提升社会工作学生的文化融通的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消除学生对异文化的偏见,使学生认识到不同社会群体或族群的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意义,从而更好地走入这个助人的专业。在服务提供之时,能够设计出适合特定社会群体的项目,以更好地回应他/她们的需求,协助他/她们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NASW, 2001; Davis & Donald, 1997; Gallegos, 1982; Gutierrez & Lewis, 1999)。

不过,我们觉得在社会工作专业中对于文化敏感性的论述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社会工作谈文化敏感的时候,往往假设文化敏感性就像一般学科的外在知识,通过学习和训练是可以获取的;第二,文化敏感性的问题只是针对异文化而言。然而,在我们的实践当中,越来越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文化敏感性是否只是一种外在知识呢?是否通过课堂训练就可获取呢?文化敏感的问题是否只是针对异文化的环境而言呢?在自属的文化处境下,我们是否就没有文化敏感的问题呢?

在本土人类学的讨论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文化的问题不只是在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之间才存在的。就算我们置身于自属文化的社会

中,也同样需要正视文化的问题(潘英海,1997;张少强、古学斌,2006)。台湾人类学者潘英海(1997)认为,其实本土人类学置身于田野当中,也常常会对本土文化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错误的认知和理解。在这种情形下,本土田野工作者仿佛经历了类似于西方人类学者的经历,那就是在认知上和心理上的震撼——即所谓的“文化识盲”。

其实不只是人类学,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采用类似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的研究者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在研究历程中,研究者都是以自身作为研究工具,进入一个诠释学或现象学所指称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即人类在特定时间、空间下所建构的整体性生活经验。民族志田野的研究就是透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遇,通过对异己的了解和比较,在相互辩证的历程中,突破自身了解的限制,对生活世界产生新的诠释和新的理解。这一研究过程涉及研究者之生活经验与被研究者之生活经验的“相异”和“相似”。“相异”的知识论基础在于产生对照和比较,从而产生更深层的理解;“相似”的知识论基础在于熟悉和累积,透过这累积的过程,产生更多的体会和了解,于是经验才能转化为体验。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表述,研究过程就是在于研究者的现象世界与被研究者的现象世界之间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及文本(text)与脉络的意义解读(邱文彬,2001)。

潘英海(1997)认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性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文化负载”(cultural laden)的问题,汉森称之为“理论负载”(theoretical laden)(Hanson, 1969)。所谓“文化负载”,简单而言是指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所背负着的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了解系统,它们是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不同的生活世界进行区辨和转译的凭借。而“理论负载”则指出,研究社群在学习历程中经历一段时间的训练,累积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和理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不自觉地成为研究者看问题/看事物的“识框”(framework)。因此,研究者不管是在异地或本土从事研究工作,都是在背负的文化/理论之下进行的,研究者的知觉或观察,并不是“看到”(seeing)他/她们所看到的实相,而是将所“看到”的现象“视如”(seeing as)某种实体,而所有这些都是受到研究者所背负的理论/文化(或学科训练)所制约的。

总而言之,人类的了解历程都是在了解者与被了解者彼此的“文化负载”下进行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文化的盲点就不只是在研究者面对异文化时才会产生。就算研究者身处熟悉的文化环境,了解的是自

属的文化群体,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之互主体性的了解也在“文化负载”/“理论负载”下进行的。正因如此,身处同一文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涵化”(acculturation)的经验中是否相同或相容,就值得我们重新考量(邱文彬,2001;潘英海,1997)。“文化识盲”的问题正是在此脉络下提出来的。

“文化识盲”与教育人类学的另一个概念“文化识能”(cultural literacy)有关。“文化识能”是指在一个社会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个人所学习到的有关所处社会中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之娴熟程度,是否足以让他/她与该社会中的其他人进行沟通。对自身文化娴熟程度的深浅,会影响到个人对文本的诠释以及对其他个人或团体的了解。当研究者对于所处文化社会状况的背景知识了解不足或产生离异时,如同不识字的文盲一样,会对其以为熟悉的处于自身文化社会中的被研究者的文本解读陷入盲区,以其自身的文本(所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被研究者的文本;以其所熟悉的、相似的价值体系或解码系统,解释被研究者行为环境的讯息,以致自我意识失去区辨、判断、选择的功能,产生“文化识盲”的现象(潘英海,1997)。

我们在云南农村所遇到的难道不是一种文化识盲的状况吗?我们怎么连村庄的姓氏和宗族关系也搞不清楚?村民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价值信仰,对此,我们竟然缺乏基本的敏感度。人类学所谈之“文化识盲”的概念比起社会工作所谈的“文化敏感”来,不是更加有助于我们思考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吗?

五、文化识盲与专业陷阱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专业,有一套特定的文化、信念和价值。当我们这个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包括内地和香港的成员)来到云南绿寨从事农村社会工作时,很自然会持守我们的专业理念和价值观。虽然我们也同样受过文化敏感的课程训练,时刻提醒自己要敏感于当地文化的差异,不要破坏当地的文化。我们所学习的专业技巧也教导我们如何融入社区,更好地了解社区的文化和当地的需求。然而,我们对于专业训练所赋予的文化负载或理论负载——信念、价值观、理论、技巧手法等——却没有很强的意识。

最初，我们对于这个专业团队组合是有自信的：她不仅有云南当地的社会工作教育者，也有来自香港的多年在少数民族农村从事发展工作的老师。因此，本地的社会工作者觉得自己就是云南人，太轻易地觉得自己只要呆在村里一段时间，就可以熟悉当地文化，将很多问题看成是理所当然；而来自香港的成员也持着多年在中国不同农村从事发展工作的经验，以为进入绿寨工作也必然一样得心应手。这种轻率的态度产生于我们熟悉本土的自信，其实也是问题产生的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进入农村推动工作，我们这些社会工作者对于专业知识包括理念、理论和专业手法有一种深层的自信，没有充分地反省我们所拥抱的这些知识在村落中的可行性和可能产生的问题（包括文化冲突等）。案例一所展现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专业知识所带出的文化识盲问题。

对于专业社工来说，要传达想法、达至共识，推动参与，作出民主决定，那就要开会讨论，分享意见，这是“最正常合理不过”的做法。正是这样，在村里面工作4个年头，我们依然固守着自己的那一套。

表面上看来，我们的困难很大程度在于语言表达上，但是，仔细观察之，语言沟通的困难背后存在几个不同层面的文化/理论负载的问题。第一，专业带给我们太多的专业用语。泡在学院久了，一串串专业的术语变成了我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我们习以为常地脱口而出。就像我们与村民开小组会的时候习惯用“分享”、“感受”、“争取”、“反思”、“快乐”、“休闲”、“放松”，甚至“性别关系”、“权力关系”等等词汇。这些我们所熟悉的词汇，对村民来说不但陌生，而且难以揣摩其中的意思。因此面对我们，他/她们要么就用自己的概念来诠释我们的话语，要么就只好带着为难的表情对我们说，“我们不懂”、“不会说”。这一过程中对当地人所产生的自卑感和矮化作用，与我们理念是相违背的，而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

另外，关于语言问题，值得警醒的还有，作为知识分子和老师，我们习惯了滔滔不绝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来传情达意。语言文字对我们来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难度可言；而对村民来说，文字的表达并非惯常的沟通和表达方法，何况大部分村民没法掌握和操作书写和阅读的文字。当我们与他/她们的分享沟通诉诸于文字，这无可避免地窒息了他/她们的表达和创造力。这似乎再次与我们希望透过小组分享能够增能/培力（empowerment）的构想背道而驰。歌唱、舞蹈、音乐

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当老人们要表达情感的时候,他/她们习惯于用小调来传情达意。舞蹈也是村中年轻人或老人喜欢的活动,为何我们就没有意识到选择一种真正能够让他/她们冲破文字限制,充分发挥他/她们的创造力,表达他/她们的所思所想的方法来开展组织工作呢?也许我们太习惯了文字,太习惯从我们自己觉得舒服、方便的方式出发了,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呢?

我们与村民的权力关系同样反映在普通话和当地语言的运用上。村民用普通话跟我们沟通,结结巴巴的就像我们用外语一样。他/她们不是完全不懂普通话,只是没法清楚、顺畅地表达心中的意思和感受。他/她们对我们的尊重和迁就把我们这些外来人给宠坏了。从进入村落至今,我们并没有致力学好壮语,使我们无法跟村民很好地沟通。虽然在我们反思工作中面对的困难时,也不断强调要让村民来教我们壮语,但这构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语言沟通并不只是谁迁就谁的问题,更深层的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放下我们的权威和位置。还有,语言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本身的语言局限也已规限了合作的对象及与他们的关系。由于我们不懂壮语,限制了合作对象必须是有初中文化和略懂汉语的村民。这种筛选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排斥的过程,使得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不懂汉语的壮族村民无法直接参与我们的行动,从而埋没了这批村民的声音,使他/她们成为失声的另一群。他/她们的需要只能透过那些懂汉语和具有初中文化的村民来呈现和表达,这一过程极有可能再次制造了地方社区的等级关系,同时也强化和巩固了汉语教育优越的地位以及主流教育的意识。^①

对话的环境也是我们缺乏敏感的地方。以我们的习惯,在一个寂静的教室,整齐地围坐着就是理想的开会环境,可是,这种环境对村民而言却往往造就了局促、紧张、不安、沉闷的感觉。究其原因,一来村民成长的经验中所获取的讯息是,教室代表的是严肃的学习场所;二来在村民的生活中,围坐是闲来时说说笑笑的,要认真讨论问题当然有点不习惯;三来是对他/她们来说,我们都是老师,“我们”代表了“有文化”及“权威”,面对老师自然不能随便表达意见了。

除了言语文化之外,对时间的感觉同样存在差异。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人而言,时钟是我们必备的,每天繁多的工作让我们要争分

^① 我们在贵州的项目也有类似的反思,见古学斌、陆德泉,2002。

夺秒，计算每时每刻。以避免浪费时间，完成计划要做的事。因而守时成为一个公认的生活标准。反观农民生活的节奏，主要是与日照及天气、节令及季节相配合，“时”与“刻”这时间量度单位太“小”了，并没有重视的必要。所以对村民来说，会议的时间就是“完成农活、吃饱晚饭后”，而不是“晚上八时半”那样具体。

在与村民沟通的过程中，我们的关心常常凌驾于村民的关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村民并不这样想的。譬如我们常常会问村民，“大家快乐吗？”“为什么觉得快乐？”“现在的快乐跟过去有什么不同？”“除了快乐还有什么感觉……”这些是我们惯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了促进大家梳理和面对个人的感觉。有趣的是，搞清楚这些感觉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村民来说，开心就是了，还需要说什么呢！另外，我们的思考逻辑也有别于村民。简单来说，逻辑就是一些相关想法的脉络。我们当然接受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提升到思考逻辑的层次时心目中却往往存在着牢固的“真理”，以判别什么是合逻辑的，什么不是。以搞活动为例，我们自然认为先要弄清背景、理由，然后制订目标、活动内容及结果，最后是行动的日程细节，还要加上评估方法及财务预算，这才是有系统、有逻辑的思维，亦是确保活动成功的基础。然而，村民纵然没有我们认定的“完整”思考逻辑，但他/她们也有搞活动的“土”方法，只是我们未能理解他/她们思考问题的重点及判断罢了。

通过案例二，我们希望更进一步讨论专业陷阱和文化识盲的问题。要剖析其中的文化识盲，不妨先由我们的工作策略开始探讨。我们起始是以这样的逻辑开展工作：要持续地改善村民生活，首先就要促进他/她们的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要促进合作，就要建立他/她们的组织；要形成组织，自然就是以他/她们的村落作为基础，就近凝聚在一起；当合作有成果，就应该摆脱个人的利益考虑，平均分配。这些都是社会工作者普遍接受的思考逻辑及价值观。问题是在农村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这些逻辑及价值观是否应该因文化的差别而改变？更明确一点说，我们深信不疑的逻辑及价值观，是否只是反映了以现代城市为本位的文化和专业价值，而忽略了农村的特点和差异呢？

宗族姓氏这一概念在城市早已式微，所以城市的组织工作只需以家庭甚至个人为单位；邻居之间则建立互助网络，守望相助。同时，由于城市社区不断因发展而发生变迁，因而以地理及行政社区作为基础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可谓是想当然的选择。

反观农村,虽然家庭仍可以理解为最基本的单位,但社区的动力却存在极大的差异。首先必须指出,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等行政单位只是近代的产物,自民国开始人们才把城市的一套体制移植到农村。在此之前,中国农村可以说是长期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的状态,除了缴纳皇粮及征兵外,并没有其他的义务(见 Duara, 1988)。所以,宗族及姓氏势力在民间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力量。虽然近代出现过无数次人口流徙,而建国以后又不断整肃旧有的乡党势力,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氏族在农村的影响力可谓“春风吹又生”。因此,“自然村”只可以理解为基于地理环境而出现的聚落,当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及其利益效果是不该被忽视的。

上述对农村社区文化的理解,一方面表明农村社区相对城市社区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亦反映了社会工作者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运用工作的策略及价值观,否则就会很容易陷入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就好像对于平均分配利益这一原则来说,个人是否得到合理分配已不是惟一的考虑,族群之间的矛盾在组织过程中的影响却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

六、结 论

在社会工作专业的讨论中,“文化敏感性”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大家一致认同“文化敏感”所具有的重要性,强调要尊重文化的差异,努力在不同文化的脉络下提供适合当地民众的服务。然而,在社会工作专业中,却极少深刻地反思文化的概念,往往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外在的静态的东西,学懂了、理解了就能解决问题。同时,专业社工也往往把文化敏感只看成是技巧的问题,似乎掌握了就可以操作。而且,社会工作专业也很少深刻地反省专业本身的价值观、理念和手法。

然而,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不重新认识文化的问题和反思社会工作价值观和手法的话,我们将陷入如人类学所说的文化识盲的陷阱。社会工作实践或行动研究恍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该过程都是在文化负载或理论负载下进行的。我们置身于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之中,得到新的“经验”,同时新的“经验”必须透过自身原来的诠释系统而产生理解性的“体验”。因此,我们的“文化识盲”不是简单的文化敏感性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基于我们对于专业知识的拥抱和信靠。巴西

教育学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早有警言,参与民众解放工作的知识分子,“仍然带着其出身的标记”(弗雷勒,2003/2000:93)。研究者的背景知识与被研究者的背景知识之间是有差距的,他们之间的社会位置也不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教育程度、性别、阶级、家庭背景、文化资本、种族等。作为学院里的人,我们的“专业”知识背景除了在生活经验和文化价值上与被研究者不同外,还深受学术文化、学术理论、学术体制的影响和支撑,因此,我们对某个研究点和研究对象的背景知识也是受以上各种因素所形塑和影响的。

专业知识不是说不重要,但如果把专业知识变成是刻板的教条,固守已有的信念,专业知识将是另一种陷阱,它不但不能实现我们能力建设理念,反而可能变成对当地民众的伤害。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同的本土脉络(indigenous context)下反思社会工作者自我承载的专业知识,努力探索消解我们这些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地方性民众间的文化鸿沟的方法,与村民一同前进。

发现文化差异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自我先从社会和教育建制的专家里解放出来,真正以一种非专家的身份与村民进行对话,促成彼此之间的意识提升,发掘我们彼此的能力。尊重地方性村民和文化不是单纯的口号理念,需要在践行中真正放下我们的身段,真正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处理好这些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他/她们真正成为地方发展的主体。

这篇文章是我们对过往6年在中国农村推行农村社会工作的反思,其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社会工作要在中国乡村扎根,必须先处理社会工作者主体位置的问题,审视在实践中出现文化识盲的原因。我们除了需要细致理解村落文化的内涵和运作,敏感觉察地方性村落文化的重要性之外,更加需要自我反思专业知识的盲点和陷阱,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村民的行为规范基础,在此基础上专业的“助人自助”之道、之技,才会行之有效。

最后,我们以巴西教育学家弗雷勒的一段话作为结语,以此自省并与同僚共勉。

那些真诚地将自己投入民众的人,必须不断地重新检视自己。

他们的改变必须十分彻底,以使得他们的行为不得有任何暧昧不明之处。假若他们一方面相信他们的投入是真实的,但另一方面却认定自己是革命智慧的拥有者——这种革命智慧稍后必将赐予民众(或者强加于民众身上)——那他们就是仍然在保持老旧的方式。那些宣称自己献身于解放的活动,但却不能与民众结合的人,由于他们相信民众是无知的,所以他们所做的仍只能算是自我欺骗……他们试图强化自己的“地位”。从某些角度来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原来的出身仍有所依恋。

向民众靠拢的转变,所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重生(rebirth)。凡是经历过此种重生体验的人都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存在形式;他们不能再是从前的自己。(费雷勒,2003/2000:94)

参考文献:

- 保罗·费雷勒,2003/2000,《受压迫者教育学》,方永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 古学斌、陆德泉,2002《口述历史与发展行动的反省:以中国贫困山区教育扶贫项目为例》,《香港社会学学报》第3期。
- 邱文彬,2001,《社会支持因应效应的回顾与展望》,《人文及社会科学》第11期。
- 潘英海,1997,《文化识言与文化纠结: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问题》,《本土心理学研究》第8期。
- 亚伦·约翰森(Johnson, Allan G.),2002/1997,《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与承诺》,成令方、林鹤玲、吴嘉苓译,台北:群学出版社。
-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4《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质与介入策略反思:以西南贫困地区综合社会工作介入项目为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2期。
- 张少强、古学斌,2006《跳出原居民人类学的陷阱:次原居民人类学的立场、提纲与实践》,《社会学研究》第2期。
- Bennett, T. 1980, "Popular Culture: A Teaching Object." *Screen Education* 34.
- Butler, L. S. & Christain E. Molitor 1995, "Cultural Sensitiv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Family."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06.
- College of Nurses of Ontario 2005, *Cultural Sensitive Care*. Toronto: College of Nurses of Ontario.
- Davis P. & B. Donald 1997,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Assessment, Evalua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Duara, P.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legos J. S. 1982, "The Ethnic Competence Model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B. W. White (ed.), *Color in a White Society*. Sliver Spring MD: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 Gutierrez, L. M. & E. A. Lewis 1999, *Empowering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nson, N. R. 1969, *Perception and Discovery: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Inquiry*. Freeman; Cooper & Co.
- Jackson, V. & L. Lopez (eds.) 1999 *Cultural Competency in Managed Behavioral Healthcare*. Dover, NH: Odyssey Press.
- Johnson, Allan G. 1997,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u, H. B., S. C. Yeung & P. Sung 2005, "Searching for a Capacity Building Model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24.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 2001, *The Standard for Cultural Competenc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 O'Hagan, Kieran 1999,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in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4.
-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 Zuber-Skerritt, Ortrun 1996, *New Directions in Action Research*.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古学斌、杨锡聪)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张和清)

责任编辑:谭 深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Enterprises Institution or Social Environment; Wage determination model of migrant workers in Peal River Delta *Liu Linping & Zhang Chunni* 114

Abstract: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in Peal River Delta, the article proposes a wage determination model of migrant workers. It is found that as well as gender and age, human capital, which is measured by years of schooling, training and work etc.,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age of migrant workers. The scale and work type of enterprise also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age. But the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ir influence. Whether the workers have contracts with their employers doesn't affect their wages, even during the period of labor scarcity. The variabl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wag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wage of peasant workers is low, rigid and do not change with region or supply of labor. It is highly market-determined in the segmented labor market, and it lack inner enterprise labor market and promotion system.

Computer Simul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and Its Methodology Meanings *Sha Lianxiang, Liu Ying, Wang Weidong & Chen Yu* 138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about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on mass social psychology. Based on a series of online survey during SARS, the simulation provides a way to predict the status of social psychology during crisis. Two layers of simulation are conducted in this research. One model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ner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variables, the other model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atent factors of inner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outer variables, which shows the multi-layer structure of social psychology phenomena. The simulation results display this method's potential on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The authors concludes from their simulation that when studying the complicated phenomena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people's social psychology, we need a perspective from multi-layer medium and latent factors assumption.

Professional Trap and Cultural Illiteracy: A reflection on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Southwest China
..... *Gu Xuebin, Zhang Heqing & Yang Xiang* 16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to experiment the Capacity Building Model in a village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aims at developing rural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ainland. This paper contains

reflections about the social workers' experiences. In their journey with the villagers, the researchers began to realize that cultural illiteracy is an essential obstacle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rural China.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f we are insensitive 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contex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an be useless to the local people, or even worse, if not handled carefully, can become cultural invasion to the local community.

DEB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onse Rates and Others: Another explanation to “high” response rates for Chinese social survey *Hao Dahai* 180

Abstract: This is a response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aper “Is It Really Better to Have Higher Response Rates?” published earlier in this journal.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in the present article that the previous critique was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concept of survey research: the sample size. This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invalidates the central arguments made in that earlier article, including the critique to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paper presents evidence showing that several recent large-scale social surveys yield similar response rates. I argue that the issue of low response rate has not attracted adequate attentions from survey researchers. Survey researchers in China are facing very different social reality from 10 years ago, when response rate was a trivial issue. As it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get adequate cooperation from respondents especially urban respondents, it is the time for us to give some serious thoughts on the issue of low response rate and try to work collectively and creatively on possible solutions.

On the Sample Size and the Response Rate *Feng Xiaotian* 195

Abstract: The paper responds to the critique by the paper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onse Rates and Others”. The author points out firstly that the critique’s starting point is impro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sponse rate given by himself is the same as that given by Foler, and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s to the concept of sample size, and to the sample size of CGSS2003 are clear and correct, in other words, the author does not mis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sample siz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s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onse Rates and Others” who misunderstands it by changing the conception of the “sample size”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interviewed”, and has improperly introduced the “course of survey”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sample size”.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confusion about the sample size of CGSS2003.

BOOK REVIEW